
以圖證史：從圖像看唐代皇帝的車駕等級與儀制

Proving History with Pictures: Viewing the Ride Class and Ritual System of the Imperial Carriage from Images in the Tang Dynasty

古怡青*

KU Yi-Ching *

(摘要)

圖像是重要的歷史文獻，本文試圖透過圖像文獻和文本文獻對照，提供新的研究路徑。鹵簿制度具有禮儀意象，車駕形制無疑是鹵簿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從鹵簿在空間的行進隊伍來看，「車駕」是皇帝行幸隊形的視覺焦點，從車駕的形制種類與級別，也是考察鹵簿制度的視角之一。

從現存的圖像可知，唐代皇帝行幸時乘坐的車駕，在形制上具有「輅」、「輦」和「輿」三種不同形制的車駕等級。首先，從外觀上看，可分為有車輪「輅」和無車輪「輦」或「輿」兩類。第一等為「輅」，帝王車駕中最高級別的有輪車。第二等為「輦」，帶有車屋的無輪車，一般由人扛抬至肩。第三等為「輿」，不帶車屋的無輪車。第二是人力與畜力的不同。「輅」有輪，由馬匹拉車，帝王車駕中級別最高；「輦」或「輿」均無輪，由人力扛抬行走，帝王車駕中級別較「輅車」低。第三是級別的差異。在禮制上，唐代皇帝在宮廷、宮殿和巡幸等不同場合，乘坐「輅」、「輦」和「輿」三種車駕，具有嚴謹的禮制規範。

關鍵詞：輅、輦、輿、鹵簿、巡幸

(Abstract)

Images 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vide a new research path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image documents and text documents. Escort Carriage (lubu) has the image of ritual, and the Imperial Carriage is undoubted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scort Carriage (lubu)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cort Carriage (lubu) marching team in space, imperial carriage is the visual focus of the emperor inspection tour formation. The type and level of Imperial Carriage is also one of the perspectives for investigating the Escort Carriage (lubu) system.

From the existing images, we can see that the imperial carriage of the inspection tour in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his fortune had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form: chariot (lu), emperor's carriage (nian) and palanquin (Yú). First of all, from the appearance point of view,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wheeled chariot (lu) and wheelless emperor's carriage (nian) or palanquin (Yú). The first class is chariot (lu), the highest level wheeled vehicle in the emperor's car. The second class is emperor's carriage (nian), a wheelless vehicle with a car house, usually carried to the shoulder by humans. The third class is palanquin (Yú), a wheelless vehicle without a car house. The second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 power. Chariot (lu) have wheels, and horses pull carts. The Imperial Carriage of the emperor's inspection tour is the highest level; Emperor's carriage (nian) or palanquin (Yú) has no wheels and are carried by humans. The level of imperial driving is lower than that of chariot (lu). The third is the difference in level. Regarding the ritual system, the emperor used three types of vehicles, such as chariot (lu), emperor's carriage (nian) and palanquin (Yú), in different occasions such as palaces, palaces, and inspection tour, with strict ritual rules in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chariot (lu), emperor's carriage(nian), palanquin(Yú), escort carriage(lubu), inspection tour

* 淡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Tamkang University. Ph.D,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East Asian Identities Vol. 07 March 2022 (pp. 52-69)

1. 前言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述及繪畫功能：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然因「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1]

圖像很早被視為重要的歷史研究素材，但圖像與歷史能否聯繫，也引發研究者關注。[2]圖像在交流中的潛力，勝過口頭或書面文字。[3]猶如德川幕府時代將軍不像中國皇帝舉行祭天儀式，提供視覺印象的最好方法就是移動性巡迴儀式，透過「御勘定奉行」的軍事儀仗列隊，運用「御威光」的「御役威」體系，展現身分制度的威儀，彰顯出政治意義上神聖的最高統治權力。[4]

圖像是重要的歷史文獻，本文試圖透過圖像文獻和文本文獻對照，提供新的研究路徑。鹵簿制度具有禮儀意象，車駕形制無疑是鹵簿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從鹵簿在空間的行進隊伍來看，「車駕」是皇帝行幸隊形的視覺焦點，從車駕的形制種類與級別，也是考察鹵簿制度的視角之一。

秦漢以後，古代象徵身分地位的鼎等器物漸失去重要性，車服等取而代之，「車駕」、「輿駕」為皇帝代稱，即為明顯的象徵。車是傳統中國重要的交通工具，有嚴格的等級區劃。車的規制象徵使用者的身分和財富，車隊彰顯出使用者的身分和經濟地位，也是國力的展現，更具有廣泛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意義。藉由巡狩、出行時，儀仗隊伍的場面和車馬裝飾，顯示統治者的鎮撫意涵，與政治社會地位，因此，統治者極為重視車騎行列制度。[5]

《大唐開元禮》專敘《鹵簿》，唐代因國事大小不同，唐代皇帝出行的鹵簿儀制，分為大駕、法駕、小駕三等。[6]皇帝行幸鹵簿中，車駕等級分為「輅」、「輦」和「輿」三種。現存鹵簿圖像中，亦繪製皇帝出行的「輅」、「輦」和「輿」三種車駕。令人好奇的是唐代皇帝行幸途中，為何設置「輅」、「輦」和「輿」三種不同級別的車駕？根據不同地形或目的，使用「輅」、「輦」或「輿」的場合有何不同？

唐代車駕的論著至今仍付之闕如，練春海《漢代車馬形像研究—以御禮為中心》，[7]通過漢代車馬的視覺

形像為主要研究方向，討論漢代車馬裝飾、車儀與出行，系統地分析御禮的淵源與流變，為漢代車馬研究最完整的專著。劉增貴〈漢隋之間的车駕制度〉論述漢代、魏晉至隋代車駕的社會意義、形制與等級區劃，及皇帝車駕行列的出巡儀仗制度，兼論魏晉以後牛車取代馬車的趨勢，為目前學界有關車駕制度最詳盡的研究。[8]然而，上述論著均未論及唐代皇帝的車駕制度中，輅、輦、輿的車形、使用場合和區別等級，本文擬增補這方面的缺漏。

目前學界對於唐朝鹵簿圖像與車駕類型研究仍付之闕如，此為本文探究的論題之一。本文嘗試從圖像與文字的聯繫作為印證，經過文本材料與圖像的比對，探索與反思視覺材料與文本的差異性，從而進一步驗證與勘誤。圖像所傳達的訊息，雖然不一定能完全依照大駕鹵簿儀度所描繪，仍應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本文試圖從現存繪畫的鹵簿圖像，與墓室內鹵簿儀衛壁畫為線索，理解皇帝陸路出行車駕的形制。關於水路出行的交通工具，日後另文再探討。

本文希冀在學界研究基礎上，從唐代皇帝巡幸鹵簿的車駕著手，探究「輅」、「輦」和「輿」的車駕形制特徵，及禮制上車駕所呈現的文化意義與脈絡。藉由唐代車駕等級的規範，反映出唐代皇帝乘坐車駕在交通運輸的使用實況。

2. 圖像中皇帝車駕的意涵與文化脈絡

唐代皇帝行幸時乘坐的車駕，從現存鹵簿圖像的外觀上看，可分為有車輪和無車輪兩類：第一類有輪車為「輅」；第二類無輪車，稱為「輦」或「輿」。以下將從唐代皇帝第一類的「輅」和第二類「輦」、「輿」兩類，分別論述之。

2.1 有輪車：「輅」的形制特徵

輅，《說文解字·車部》：「車軫前橫木。」[9]本指古代車前的橫木，以部件概稱全體。《國語》卷13〈晉語〉記載鄭伯嘉來納輅車十五乘，韋昭注曰「輅，廣車。」[10]輅為廣車，意指大型車。《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玉輅，以玉飾車也。輅亦車也。謂之輅者，言行於道路也。象輅、金輅、木輅，各隨所以為飾名之也。」[11]後指帝王專用的大車。

先秦時期，「路」通「輅」，《周禮》載「王之五路」，指周朝君王乘坐五種車駕，分別為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其差異在於旗幟和馬的飾品，在各種重要場合分乘坐五種不同的車輅。參見「表一《周禮》王之五路表」。[12]

表1 《周禮》王之五路表

王五路	旗幟	馬飾品	輿器	禮儀
玉輅	大常旗-日月交龍、十二旂	蒼盧	十二就	祭祀
金輅	大旂旗-交龍	革帶飾金鈎	九就	會見賓客、封同姓諸侯
象輅	大赤旗-鷹隼	朱色馬飾	七就	上朝、封異姓諸侯
革輅	大白旗	黑色皮革	五就	軍事、封邊疆諸侯
木輅	大麾旗-龜蛇	白色馬飾	五就	田獵、封蕃國諸侯

歷代皇帝以車駕彰顯帝王威嚴，各朝輿輦等車駕形制所有改變，見《隋書》卷10〈禮儀志〉：

輿輦之別，蓋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隨

時而變，代有不同。[13]

然而，上述《周禮》記載周朝君王乘坐的「玉輅」等車駕，秦漢時皇帝乘坐「金根車」，尚未見「玉輅」記載或文物出土。[14]秦始皇車駕以金為裝飾，稱「金根車」，車上插旗，旗上有飄帶為「旂」，秦從水德，以六馬駕車，相應水德之數量。漢武帝天漢四年（97B.C.），始定輿服之制，車駕儀仗始稱「大駕鹵簿」，皇帝郊祀出行乘「金根車」。[15]東漢光武帝遷都洛陽，確立「鹵簿」制度，[16]建武十三年（37），得到公孫述葆車，才開始具備輿輦等車駕。[17]東漢以後，「玉輅」成為帝王乘坐最高級的车駕。東漢光武帝仿照周的禮制，改定玉輅為皇帝最尊貴的车駕，稱「鳳凰車」，金根車為副車。東漢時期「輅」的形制，以六馬駕「輅」，在車箱後皆斜插兩旗，一面為旂旗，旗上畫日、月、蛟龍。旂旗有二特徵，一是旗上畫蛟龍，二是竿首有鈴。[18]「旂」為旗上飄帶，其數量代表乘輅者的身分象徵，如天子旂旗十二旂、公侯乘安車九旂、王公之子攝命理國者安車旗七旂、封侯之元子五旂。[19]另一面左纛為以犛牛尾為裝飾的大旗，上方用十二個金黃色綢緞扎的球狀飾物稱為「金就」，插在左駢馬軛上，又名「德車」。[20]

西晉修改「輅」的形制，晉制天子之「輅」有兩個最重要的特色：第一，輅車的兩車廂以玳瑁製成兩個很大的羽翼即鷗翅，加上金銀裝飾，稱「金鷗車」，唐代稱鷗翅為「金鳳翅」。[21]第二，輅在車箱後皆左右斜插兩旗，皆有「囊」即袋子囊裝。左方插旂旗，右方插柴戟，「韜」為柴戟罩袋，上方為繡黑與青相間的花紋，並有「亞」字。[22]以三尺長、八寸寬彩繪紅布油繫在軸頭上，東漢稱「飛輪」，西晉改用彩繪的蛙蟆幡。[23]

西晉天子車駕最鮮明的例子可見於晉顧愷之「洛神賦圖」，洛神所乘的「輅」，由六馬駕車，並可見天子

「金鷗車」的鷗翅，兩面旂旗和柴戟，尤其旂旗的飄帶十二旂，均符合洛神身分象徵的車駕，見「圖1 晉顧愷之洛神圖」。



圖1 晉顧愷之洛神圖[24]

此外，顧愷之「洛神賦圖」中「東歸圖」，曹植所乘的輅車，由四馬駕車，雖可見旂旗和柴戟，但沒有「金鷗車」的鷗翅，旂旗九旂，均符合曹植王公身分的車駕禮制，見「圖2 晉顧愷之洛神圖-曹植東歸」。



圖2 晉顧愷之洛神圖-曹植東歸

天子五輅真正從經典進入現實非西晉武帝時期，而應在南朝宋時期。[25]如大明四年（460），孝武帝乘坐剛製作玉輅親往南郊祭天。[26]宋明帝泰始四年（468）8月，對五輅進行全面改革，「更制五輅，議脩五冕，朝會饗獵，各有所服」。[27]劉宋經歷被創造、進而形成一套完整制度，又融合於王朝秩序體系的過程。[28]北魏輅車圖像存世甚少，北魏道武帝天賜二年（405），改大駕行進的陣型，更名為「方陣鹵簿」。步騎內外列為四重，天子有五色車旗，各處其方。[29]北周天子車駕的例子可見於敦煌296窟北周壁畫，東王公所乘駕龍「輅」上，可見「金鷗車」的鷗翅、旂旗和柴戟，旂旗的飄帶九旂，駕四馬，前有羽人開道，兩旁文鯢、蛟龍護衛，飛天隨行，前後浩蕩護謁，見「圖3 敦煌296窟東王公圖」。[30]



圖3 敦煌 296 窟東王公圖

從上述可知西晉到北朝，天子輅車駕馬數量歷代亦有變革。西晉天子玉輅駕六馬，其餘金、象、革、木等輅駕四馬，[31]南朝陳承襲。[32]北魏孝明帝熙平年間，採納侍中崔光與安豐王延明、博士崔瓚建議，改五輅並駕五馬。[33]

中國古代神話傳說，認為東王公就是西周穆王。周穆王欲巡遊天下，造父為他駕車，見《列子集釋》卷 3〈周穆王〉注載《史記》：

造父為穆王得驊騮、綠耳、赤驥、白犧之馬，御

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34]

周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宴請西王母於瑤池。[35]漢代以後東王公、西王母經常出現在墓室壁畫中，北周、隋代壁畫亦沿用。前述西周穆王時尚未建立完備的車駕禮制，敦煌 296 窟為北周時期壁畫，應參考北周禮制，《隋書》卷 10〈禮儀志〉「輿輦·周」：

君駕四，三朝六轡。卿大夫駕三，二朝五轡。士

駕二，一朝四轡。[36]

東王公所乘駕龍「輅」，由驊騮、綠耳、赤驥、白犧四馬駕車，具備北周天子輅車駕四馬儀制。然而北周天子旂旗的飄帶十二旒，[37]敦煌 296 窟北周壁畫，東王公所乘駕龍「輅」，旂旗的飄帶僅九旒，似乎與皇帝車駕不相符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圖 1 晉顧愷之洛神圖」中洛神所乘的「輅」，「圖 2 晉顧愷之洛神圖-曹植東歸」中曹植所乘的輅車，和「圖 3 敦煌 296 窟東王公圖」北周壁畫中東王公所乘駕龍「輅」，均可見兩重車蓋。天子車輅有蓋，應自東漢即有此制，[38]輅不僅加重蓋，

且裝飾繁複。南齊世祖永明初，加玉輅為重蓋。[39]但南朝齊，王子良曾上奏兩重蓋不符合禮制，《通典》卷 64〈嘉禮〉「天子車輅·天子車輅·齊」：

凡蓋圓象天，軫方象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

蓋之飾，求諸志錄，殊為乖衷。[40]

南朝齊明帝，建武中便將重蓋車輅，改為一重蓋。然而，在隋代壁畫中仍出現重蓋之制，敦煌莫高窟 420 窟的窟頂西披中間下部繪製菩薩布施乘坐的「寶車」，四馬駕一車，車頂立幡蓋，車後掛幡旗，此車造型和車上插旗的方式與上述敦煌 296 窟北周壁畫的東王公所乘駕龍「輅」相同，均有鷗翅、旂旗和檠戟，旂旗的飄帶九旒，唯一不同的是寶車為兩重蓋。參見「圖 4 敦煌莫高窟 420 窟「寶車」圖」。[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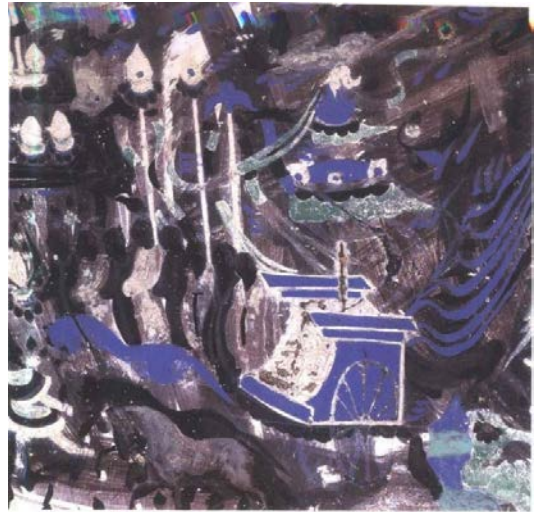


圖4 敦煌莫高窟 420 窟「寶車」圖

隋文帝即位，有鑑於北朝為胡人政權，北魏、北周輿輅不合禮制，更改北周輿服制度。[42]唐代以後不再沿用重蓋制度，唐代車輅僅有一重車蓋。唐代車輅罕見有圖像存世，《宋史》卷 149〈輿服志〉「五輅」詳細記載唐代玉輅形制：

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至宋曰顯慶輅，親郊則

乘之。制作精巧，行止安重，後載太常與闐戟，

分左右以均輕重，世之良工，莫能為之。……青

畫輪轅，銀轂乘葉，三轅，銀龍頭，橫木上有銀

鳳十二。左建青旗，十有二旒，皆繡升龍；右載

闕戟，繡黻文，並青繡網杠。[43]

有關唐代輅車圖像存世甚少，唐代墓室壁畫中僅見懿德太子墓中出現太子儀仗圖，全長約七米，儀仗隊分為騎馬衛隊、步行衛隊、車隊三部分組成。懿德太子墓第三天井東、西壁儀仗圖中所畫為三車三馬，明顯可看出有車輪，應是象徵皇太子乘坐的「金輅」。[44]（參見「圖5 懿德太子墓金輅圖」）[45]



圖5 懿德太子墓金輅圖

懿德太子墓「金輅」車頂有一重朱蓋，車後插旒旗和檠戟，前面一輛車尚能看到八旒，有一旒被遮擋，原應為九旒。[46]輅車為紅色，上有紅色華蓋，車廂左插九旒旗，右插繪有黻紋的檠戟，具有「赤質」、「朱蓋」，「左建旒九旒，右載闕戟」的特徵，懿德太子墓當為「金輅」，符合唐朝皇太子車輅的規制。[47]（參見「圖6 懿德太子墓西壁輅車圖」、[48]「圖7 懿德太子墓東壁輅車圖」）[49]



圖6 懿德太子墓西壁輅車圖



圖7 懿德太子墓東壁輅車圖

懿德太子，本名李重潤是中宗李顯的嫡長子，死於長安元年（701），中宗即位後，神龍二年（706）追贈皇太子，諡曰懿德，陪葬乾陵，重新以「號墓為陵」禮制改葬，[50]懿德太子雖非皇帝，但懿德太子墓壁畫「金輅」，應符合唐代的形制。唐代皇帝巡幸乘坐的

「輅車」皆由六匹馬駕車，因出行目的不同，分為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五種。[51]五輅的樣式大致相同，只是顏色和裝飾不同，[52]每輅均以六匹馬駕車，駕馬數量不是等級最重要標準，更重要的是車馬的裝飾和配件，才是區別等級最重要的標準。

雖然目前罕有唐代車輅圖像存世，史籍記載唐宋時期曾數次造玉輅。唐高宗顯慶年間造玉輅，精巧堅固，號為「顯慶輅」，乘坐安穩如山，猶如杯水放置車駕而不搖，經歷五代至宋代仍沿用此玉輅。[53]唐高宗麟德三年（666）、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5），宋真宗祥符元年（1008）三次封禪，均乘「顯慶輅」三登泰山。玄宗開元十一年（723）、真宗祥符四年（1011）兩度巡幸亦乘此輅。「顯慶輅」一直使用到宋仁宗時毀壞，慶曆年間再造玉輅，製造極為費工繁瑣，但乘坐其上竟然搖晃不安穩，「神祖苦風眩，每郊祀，益惡舊輅之不安」，[54]後漸廢棄不用，仍乘坐唐朝舊輅。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春正月丁丑朔（21日）造新玉輅，製作異常精巧，但尚未使用，僅陳列於大慶殿庭前，半夜三更，大風自北方來，玉輅竟被屋樑上掉落的木頭墜落壓壞破損。宋神宗不乘坐新輅，仍乘坐唐高宗所製「顯慶輅」。[55]

令人好奇的是宋代兩度造玉輅都廢置不用，為何均以失敗告終？究竟宋仁宗與宋神宗所造玉輅，與唐高宗「顯慶輅」有何不同？有關宋代車輅可參考現存宋代《大駕鹵簿圖書》，參見「圖8《大駕鹵簿圖書》局部」。[56]



圖8 《大駕鹵簿圖書》局部

此畫卷繪製的內容是宋仁宗前往城南青城祭祀天地乘坐五輅的場景，前述說明長卷應繪製於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宋仁宗慶曆年間已造輅，為何廢置不用？若從此圖繪製的時間，無法得知此圖繪製是唐制車輅還是宋制車輅？回答此疑問，應從唐宋車輅形制改變談起。參見《朱子語類》卷128〈本朝〉「法制」：

今玉輅太重，轉動極難，兼雕刻既多，反不堅牢，

不知何用許多金玉裝飾為也？所以聖人欲乘殷之

輅，取其堅質而輕便耳。仁宗神宗兩朝造玉輅，

皆以重大致壓壞。本朝尚存唐一玉輅，聞小而輕，

捷而穩，諸輅之行，此必居先。或置之後，則隱

隱作聲。[57]

唐代車輅目前尚無存世圖像，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前述懿德太子墓。神龍二年（706）年，中宗改葬懿德太子墓，此墓壁畫所繪製「金輅」應參考唐高宗「顯慶輅」的形制。若以《大駕鹵簿圖書》與前述懿德太子墓車輅相較，共通點為車頂均有一重朱蓋，亦由六匹馬駕車。但最大的差異是懿德太子墓「金輅」，車廂左插九旒旗，右插繪有黻紋的檠戟，象徵皇太子車輅。唐代天子玉輅應插十二旒旗，而宋代《大駕鹵簿圖書》五輅後插兩面大旗，顯然與唐制形式不同。

宋代《大駕鹵簿圖書》長卷呈現五輅形制，特點有二：一面旗為太常，旗上畫日、月、蛟龍，十二旒應指十二旒的飄帶，一面為闡戟變成旗，上有「亞」字。《大駕鹵簿圖書》形似西晉、南朝車駕形制，輅在車箱後左右斜插「均輕重」相同兩旗，並有「囊」即袋子囊裝。宋代五輅形制，一方面增加金玉裝飾，使車輅重量超過車軸負荷限度；另一方面是將唐朝五輅後十二旒旗改為兩面大旗，看起來較為精簡，實際上卻較為笨重，因破壞結構上的平衡，宋仁宗與宋神宗所造玉輅均因車體過重而壓壞。[58]

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造玉輅，稱「紹興輅」，與北宋車輅玉輅形制基本相似，最大的改變是將馬的畜力改為人力牽引。南宋「紹興輅」前有三輅，有三種不同用途：一是前輅，稱「鳳輅」，以馬駕車而行；二是推輅，由班直以人力推之；三是壓輅，以人力推壓於後。[59]北宋以前，皇帝的五輅基本上都是六匹馬駕車，南宋以後開始流行以人力推輅或壓輅。

靖康之難後，南宋建立新政權為取得「順乎天意」的正統地位，利用繪畫藝術達到政教宣傳目的。南宋初期有一批從北宋逃亡至臨安的畫院高手，專以寓有誠鑑意義的文學經典作品為題材作畫。[60]南宋畫院人物畫承載著特殊使命的重要功能是幫助帝王們解決不同歷史時期的複雜政治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多借助儒家思想來推動社會的整體風貌改觀。[61]臺北故宮博物院館藏「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是十三經中唯一由皇帝註釋的儒家經典，其中「玉輅圖」正符合宋高宗欲藉由「崇儒教化」宣揚崇奉儒學的目的，及「帝國映射」的

統治需要，彰顯出南宋政權的政治宣傳。參見「圖 9 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62]



圖 9 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

北宋《大駕鹵簿圖書》與「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玉輅後均插兩面大旗，但「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看不出兩面旗繪製內容，最大差異有二：一是北宋《大駕鹵簿圖書》由六匹馬駕車，南宋「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僅見四匹馬駕車。二是北宋《大駕鹵簿圖書》為三輓，南宋「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僅見兩輓，看起來比較輕巧。

另一幅為前述南宋「鹵簿玉輅圖」，繪製車輿為正方形，台上設欄杆，兩側插有龍飾布幡旗幟，其上撐有玉飾寶蓋，蓋周亦掛有兩旗，形制與北宋《大駕鹵簿圖書》相似，但繪製圖案不同，一面旗繪製蛟龍，一面旗上畫日、月。參見「圖 10 南宋鹵簿玉輅圖（局部）」。^[63]



圖 10 南宋鹵簿玉輅圖（局部）

與前述北宋《大駕鹵簿圖書》不同的是此圖車前有三輓，橫置一杆，學者提出由 15 位「仕女」抬輓和護輓。^[64]愚意以為此說法應有誤，「玉輅」負責抬輓和護輓

應為男性「班直」，並非「仕女」。值得注意的是南宋「鹵簿玉輅圖」，不見六蒼龍的六馬駕車，車身兩側置高大車輪，軸端拴挽繩，改由兩隊班直牽引，南宋玉輅不由馬駕車，改由人力牽引，表明玉輅並非都是由六匹馬駕車，唐朝、北宋，過渡到南宋玉輅的最大轉變就是由畜力轉為人力。

2.2 無輪車：「輦」、「輿」的形制特徵

第二類無輪車有「輦」和「輿」。「輦」和「輿」相似，《周禮》輦車一對稱「輦車」。^[65]從上述鹵簿圖像中可見「輦」和「輿」都無輪，兩者相似，學者將步輿、平肩輿、步輦視為同一類型的車駕，^[66]但黃正建提出「輦」和「輿」是不同的兩種交通工具，「輦」帶有車屋，「輿」不帶車屋。^[67]筆者認同後者說法，「輦」帶有車屋，一般由人扛抬至肩；「輿」不帶車屋，有形制多種，形制簡單的「板輿」，由人抬至腰際的「腰輿」，扛抬至肩的「平肩輿」等。「輦」和「輿」兩種車駕在形制和使用場合仍有不同，以下從「輦」和「輿」的形制分別論述之。

2.2.1 「輦」的形制特徵

《說文解字·車部》：「輦，輓車也。从車，从扶在車前引之。」^[68]先秦時期，輦和一般車輛區別在於人力或畜力的不同，一般車輛指馬拉的車，輦是專指由人抬的車。秦漢禮儀制度中，輦為納入皇帝之乘車體系中。輦車原為有輪子的伐步工具，秦漢以後輦車將雙輪去掉，改由人抬步行，稱為「步輦」。^[69]輦車以人扛抬而行，^[70]而非畜力，其功用之一是運載兵器，漢厲王曾派但等 70 人，與棘蒲侯柴武的太子奇謀，以輦車 40 乘至長安北谷口，此處地勢險阻之處，以人力抬輦車運載兵器至閩越、匈奴。^[71]

北魏道武帝天興初，制「乾象輦」說明「輦車」的形制，羽葆圓蓋，畫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雲斬、山林、奇瑞、遊麟、飛鳳、朱雀、玄武、騶虞、青龍，駕 24 馬。又制「大樓輦車」龍輓加玉飾，四轂六衡，方輿圓蓋，金雞樹羽，寶鐸旒蘇，鸞雀立衡，螭龍銜輓，建太常，畫升龍日月，駕 20 牛。又制「象輦」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旒蘇，金鈴玉佩，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另有「遊觀」、「小樓」等輦，駕 15 馬。^[72]

從現存圖像可以更清晰得知「輦車」的形制樣貌。山西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夫婦墓漆畫屏風繪製一幅現存「步輦圖像」。墓誌記載司馬金龍夫婦是延興四年（474）和太和八年（484）兩次入葬。榜題「漢成帝」、「漢成帝班婕妤」，左側有題記四行。^[73]（參見「圖 11 北魏司馬金龍墓木漆壁畫上步輦圖」）^[74]



圖 11 北魏司馬金龍墓木漆壁畫上步輦圖

墓中出土木板漆畫屏風，第一塊與第二塊拼合，第四幅中央四人扛在肩上一乘輦，帶有車屋，上張步篷、傘蓋，中坐一戴冕旒帝王，後隨一婦女。此步輦的形貌似當時車廂，為帝王乘坐裝飾華麗的特殊步輦。

此外，目前傳世的〈女史箴圖〉有兩個版本：第一種版本為素紙白描本，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學者認為是宋代摹本，參見「圖 12 故宮博物院藏本班婕辭輦圖」。



圖 12 故宮博物院藏本班婕辭輦圖

第二種版本為絹本淺設色，今藏倫敦大英博物館。學者認為是唐末到北宋前期之間（約 847-1075）的摹本，祖本很可能為顧愷之所作。[75]參見「圖 13 大英摹本〈女史箴圖〉班姬辭輦圖」：



圖 13 大英摹本〈女史箴圖〉班姬辭輦圖

大英摹本〈女史箴圖〉中「班姬辭輦」，與北魏司馬金龍墓木漆壁畫上「步輦」同樣繪製漢成帝坐於帶有車屋的「輦」上，班婕妤在輦後隨行。兩者在構圖和圖

像細節有很多相似性，[76]學者對於木漆壁畫受到南北畫風影響有不同論點。[77]然而，筆者以為兩幅圖最大差異有二：

第一是坐輦的人數。大英摹本〈女史箴圖〉「班姬辭輦」輦中坐兩人，而北魏司馬金龍墓木漆壁畫上「步輦」圖，僅見漢成帝坐在輦上，班婕妤在輦後隨行。大英摹本〈女史箴圖〉「班姬辭輦」右側箴文「班婕（妾）有辭，割歡（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圖中一位仕女正坐向前，後一人即漢成帝，面露憂愁，透過輦上窗子回顧輦後裊裊隨行的班婕妤。令人好奇的是為何「班姬辭輦」？漢代嬪妃能否乘輦？

漢代制度，皇后與婕妤可同乘坐「輦車」，見《漢官舊儀》卷下〈中宮及號位〉：

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婕妤，行則對璧，坐則伏茵。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78]

可推知漢代皇后與嬪妃等，乘坐由四人抬而步行的「輦」。但嬪妃能否皇帝同乘輦？大英摹本〈女史箴圖〉「班姬辭輦」圖中漢成帝與仕女同乘輦，為何不與寵愛班婕妤同乘輦呢？

漢成帝曾欲與班婕妤同乘輦，卻遭「班姬辭輦」，其原委可見《漢書》卷 97〈外戚傳〉「孝成班婕妤」：

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

「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

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

言而止。[79]

班婕妤「卻輦之德」，婉拒與漢成帝同乘輦理由是夏桀、商紂、周幽王三代亡國君主均與嬖女同乘輦，暗喻漢代君主出行時由官員隨侍在側，後宮女性不得同皇帝乘於輦，漢代制度見《隋書》卷 10〈禮儀志〉「輿輦·隋」條：

輦，案釋名「人所輦也」。漢成帝遊後庭則乘之。

徐爰釋問云：「天子御輦，侍中陪乘。」[80]

徐爰《釋問》說明漢代天子御輦，由侍中陪乘。然漆畫中卻是仕女，而非侍中等男性官員，顯然制度不符。

第二是抬輦的人數。北魏司馬金龍墓木漆壁畫上「步輦」繪製四位輦夫以肩扛抬，而大英摹本〈女史箴圖〉「班姬辭輦」繪製八位輦夫。學者認為北魏司馬金龍墓木漆壁畫上「步輦」，構圖上漆畫的呼應關係明顯不足，只是情節性圖釋，抬輦者如行屍走肉，毫無神情意態。班婕妤四分之三面向觀者，眼神不與漢成帝相對，四名輦夫皆木然直視前方，彷彿置班婕妤不顧。相對的，大英摹本〈女史箴圖〉「班姬辭輦」，漢成帝與班婕妤眼神之間存在交流，靠近班婕妤的最後一位輦夫作回首狀，似乎對班婕妤的義舉表露讚賞。[81]八位輦夫中，有兩人位於右上角，被輦遮住看不到全身，其餘六人頭戴籠冠，短衣及膝，下著長褲，足穿平底鞋，用足力氣，抬輦，左膝向前彎右腿向後撐，身體向左傾，奮力抬步輦前行。[82]愚意以為或許司馬金龍墓木漆壁畫上「步輦」圖象徵性地繪製四位輦夫，而大英摹本〈女史箴圖〉「班姬辭輦」繪製八位輦夫較符合漢代輦車制度。

有關南朝「輦」的圖像，可見廣西永福縣壽城南朝墓出土「瓷步輦俑」，[83]此墓中除出土瓷步輦俑，也同時出土瓷持旗俑、侍從俑和陶武士俑、擊鼓俑。輦呈四方形，輦頂蓬為傘形，出土時已殘。輦帶有車屋，輦上端坐一俑，輦前後都有抬輦的輦夫俑，現存前後各一人，但據底板上痕跡，原前後應有二人，應共用四輦夫，均以肩扛抬輦杆，惜輦杆已殘損無存，參見「圖 14 西永福縣壽城南朝墓出土瓷步輦俑」。



圖 14 西永福縣壽城南朝墓出土瓷步輦俑

此外，河南鄧縣南朝墓出土彩色畫像磚，亦繪製「步輦」的形貌，有一方原圖名為「抬轎畫像磚」，原磚由墓壁畫揭下，因收集而來，所在位置不明，在工地又遺失左上角半塊，但未損「輦」帶有車屋，和抬輦人扛抬至肩的形象，彩色脫落，僅存一完整拓片。河南省

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稱為「平肩輿」，圖中仍可見帶有車屋，應為「步輦圖像」。參見「圖 15 河南鄧縣南朝墓步輦圖」[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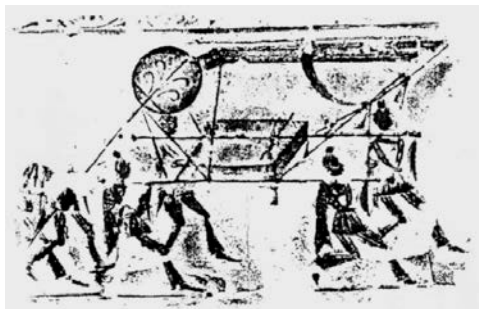


圖 15 河南鄧縣南朝墓步輦圖

此「步輦圖像」，輦的車屋呈四方形，輦側和輦板平齊處各裝一長杆，前後伸出，供輦夫肩扛之用。由四位頭戴小冠，身穿袴褶的輦夫，以肩扛抬，前後各二人。在輦前欄向後斜裝二小柱，上托一橫木極似車輦前的車軾，人坐輦上可以憑倚其上，能似床上所施隱几即憑几，狀似《隋書·禮儀志》指「隱膝」。[85]

據《大唐開元禮》卷 2〈序例·大駕鹵簿〉及《新唐書》卷 23〈禮儀志〉「大駕鹵簿」條載〈鹵簿令〉有大輦、方輦、小輦共三種，數量各一。唐朝初年置掌輦四人（正九品下），開元二十三年（735）減二人。唐朝置大鳳輦、大芳輦、仙遊輦、小輕輦、芳亭輦、大玉輦、小玉輦，共七輦，每輦六人，主輦共 42 人。據拙稿〈試論唐代皇帝巡幸的乘輿制度〉引「附表一 唐大駕鹵簿方陣表」第十五方陣「傘扇輿輦隊」中，[86]規範大輦 1 輛，由掌輦 4 人負責引輦，主輦 200 人，穿著平巾幘、黃絲布衫、大口袴、紫誕帶、紫行膝、鞋鞮。唐代有「輦腳」指負責抬輦挽御車的官員，[87]不需要嚴格考核和特殊技術，成為有門第的富貴官宦子弟入仕的起家官。[88]

前述宋代《大駕鹵簿圖書》長卷，繪製前、後方各伸出四竿，每竿五人扛抬，前後方各 20 人，左右隨行各 22 人（包含隱藏於輦後未見者），包含大輦前四位掌輦、四位指揮，大輦左右各三人主輦，畫面人物共 98 人，人數約佔《大唐開元禮》記載主輦 200 人的一半，可知此圖繪製雖為「大輦」，但繪圖中將人數精簡。（參見圖 16 《大駕鹵簿圖書》大輦圖）[89]



圖 16 《大駕鹵簿圖書》大輦圖

宋太祖建隆四年（963），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禮儀使，曾造「大輦」，親祀南郊、謁太廟時乘坐，主輦六十四人，規模較唐代精簡許多。宋真宗時認為舊輦太重，遂命別造，減七百餘斤，後常用焉。南宋以後將唐代七輦，改為大輦、平輦、逍遙輦等三輦。[90]

此外，麻生磯次編《古典圖鑑》亦繪製日本古代至明治初期，天皇、皇后、齋宮乘坐的「鳳輦圖」，無輪，由人扛抬至肩，因車屋形制上盤踞的「金鳳」而得名，稱為「鳳輦」。天皇即位、大嘗會的御禊、節會、御禊、朝勤行幸等晴天出行時等場合乘坐「鳳輦」。參見「圖 17. 天皇鳳輦圖」。[91]



圖 17 天皇鳳輦圖

此外，莫高窟第 100 窟，又稱天公主窟，建於曹義金執政晚期（931-935），完成於曹元德任職期（935-939）為敦煌曹氏家族功德窟之一，窟內世俗內容都是以曹議金夫婦為中心展開，窟主應為曹議金夫婦。[92] 曹議金夫人出行圖中，有兩車均由人扛在肩上挽拉而行，輦車帶車屋，具有「步輦」的特徵，不同的是前方的車不加輪；後方的車似有輪，且車屋的形制較前車繁複，但依然由人力扛抬，均應為「輦車」。(參見圖 18 莫高窟第 100 窟曹議金夫人出行「輦車」圖) [93]



圖 18 莫高窟第 100 窟曹議金夫人出行「輦車」圖

2.2.2 「輿」的形制特徵

唐承襲隋制，唐代交通工具中亦有使用人力的「腰輿」或「平肩輿」。大駕鹵簿有豪華的乘輿，但皇帝平時宮中乘坐較為輕便簡易的「車輿」。

唐朝又置五色輦、常平輦、腰輦，共三輦，奉輦 15 人，掌管主輦供奉等事。[94] 目前所見著名的唐代「車輿」形象例證應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唐閻立本所作絹本《步輦圖》。黃正建曾指出此圖不應稱為「步輦」，因唐太宗李世民盤膝端坐在方形榻上，不僅未帶車屋，形制也很小，由六名宮女並未扛抬至肩，而是抬至腰際，應為「腰輿」。[95] 此圖描繪在宮內接見松贊干布派來的吐蕃使臣祿東贊的真實情景，面前站立三人：最右者，身穿大紅袍，是這次儀式的引見官員；中間是吐蕃的使臣祿東贊，拱手而立，髮型和服飾與中原地區不同；最左為一穿白袍的內官。學界質疑此圖為北宋製作的摹本，[96] 但本圖生動繪製唐朝皇帝端坐在「腰輿」的場景。(參見圖 19 閻立本《步輦圖》中「腰輿」圖) [97]



圖 19 閻立本《步輦圖》中「腰輿」圖

《步輦圖》榻面兩側裝有抬竿向前後伸出，兩竿前端、後端各有攢帶。抬腰輿是兩位長裙宮女，前後各一人，將攢帶掛於頸後，再以兩首左右提竿前行。腰輿左右各有兩名同樣裝束的宮女，分別以雙手拖抬腰輿四角，以協助抬輿，另有三個宮女分別在前後掌扇和持華蓋。此畫生動傳神地表現出「腰輿」為唐朝宮廷內輕便的代步工具，可由體力不強的宮女抬行，且不用平肩輿方式，採取更為安穩的腰輿方式，使重心降低，更為平穩。

[98]

上述閩立本所作絹本《步輦圖》的「腰輿」，與日本「小輿」形似。日本「小輿」沒有車屋，四面有欄圍繞，欄上塗朱色，某些地方由金打造，隨從者從上方執傘蓋，稱「小輿」。參見「圖 20 日本小輿圖」[99]



圖 20 日本小輿圖

前述北宋《大駕鹵簿圖書》上方文字敘述，與前述「附表一 唐大駕鹵簿方陣表」第十九方陣「輦輅屬車隊」相同，[100]分別記載方輦 1 輛主輦 200 人，小輦 1 輛主輦 60 人，小輦 1 輛奉輦 12 人，服如主輦。尚輦直長 2 人，分左右，檢校輦輿，皆書令史二人騎從。參見「圖 21 《大駕鹵簿圖書》方輦、小輦和小輦圖」。

[101]



圖 21 《大駕鹵簿圖書》方輦、小輦和小輦圖

然而，《大駕鹵簿圖書》中，雖各繪製 1 輛方輦、小輦和小輿，方輦、小輦和小輿亦由人架於肩上挽拉。仔細檢視此圖，「方輦」前方一排四人，共四排，前後挽拉「方輦」共 32 人，右側隨行共 18 人，左側包含隱身於後應也有 18 人，加上一位拿銀飾梯，和一位行馬，總共 70 人。「小輦」前方一排三人共三排，前後挽拉「小輦」共 18 人，右側隨行共 6 人，左側包含隱身於後應也有 6 人，加上一位拿銀飾梯，和一位行馬，總共

32 人。「小輦」前方一排二人共二排，前後挽拉「小輦」共 8 人，左右兩側共隨行 4 人，加上一位拿銀飾梯，和一位行馬，總共 14 人。小輦後方隨從尚輦直長 2 人，分左右，檢校輦輿，另有書令史二人騎從。從上可知，《大駕鹵簿圖書》大致上依照唐代鹵簿規模繪製，不同的是《大駕鹵簿圖書》中，繪製方輦和小輦的主輦人數規模較簡略，但小輦人數相同，此外，唐代鹵簿無一位拿銀飾梯，和一位行馬，此為宋代鹵簿增加的隨從人員。

值得說明的是第十九方陣「輦輅屬車隊」記載方輦 1 輛主輦 200 人，小輦 1 輛主輦 60 人，小輦 1 輛奉輦 12 人，方輦、小輦、小輦的主輦人數共 272 人，此為大駕鹵簿分陣表中人數最為龐大的隊伍。令人好奇的是第十一方陣，「玉輅」為皇帝巡幸的車駕，駕士 32 人，為何「輦車」人數規模如此龐大，遠大於「玉輅」呢？愚意以為原因在於人力與畜力的差別，「玉輅」由六匹馬駕車，而「輦車」由主輦抬著行走，故輦車需要較為龐大的人數隨行。

此外，前述第十九方陣「輦輅屬車隊」記載在方輦、小輦和小輿後，有左右武衛五牛旗輦有 5 輛，五牛旗輦為皇帝出行五輛副車，每旗上均畫一頭牛，各有五種顏色旗幟作為標誌，稱為「五牛旗」，左邊兩頭牛畫青旗和赤旗，右邊兩頭牛畫白旗和黑旗，黃旗的牛居中。[102]各八人執之，平巾幘、大口袴，衫從旗色。左右威衛隊正左、右各 1 人騎，執銀裝長刀，後方隨從乘黃令 1 人，丞 2 人分左右，檢校後方玉輅，府史二人騎從。北宋《大駕鹵簿圖書》在方輦、小輦和小輿後，亦繪製「左右武衛五牛旗輦」。參見「圖 22 《大駕鹵簿圖書》左右武衛五牛旗輦圖」。[103]



圖 22 《大駕鹵簿圖書》左右武衛五牛旗輦圖

[118]建中四年(783),德宗倉皇出幸時,叛賊肆無忌憚「府庫輦運」財物。[119]樂從訓擔任六州都指揮使,兼任相州刺史,到任之後「搬輦軍器」。[120]憲宗即位,叛臣李錡在浙右起兵抗拒朝廷,李錡被處死後,朝廷「輦運」沒收家產。[121]或如田弘正接任成德軍節度使,度支未按時「輦運」朝廷賞賜一百萬貫錢,引起軍心不滿。[122]田弘正兄弟子姪在兩都有數十人,競相誇耀豪華,每日花費二十萬錢,「輦屬於道」表示路上運載魏州、鎮州財物的車輛絡繹不絕。[123]穆宗時十五萬鎮兵「輦運」輸境外賊軍的糧草。[124]

「輿」的形制較「輦」小,車體為方形,形同床形帳幕。南朝梁「小輿」形狀如轎車,以黃金裝飾,用漆繪畫在八根橫木上。每年元旦盛會,皇帝乘坐此車上殿,西堂喪事亦乘坐,正式出行時「小輿」跟在「大輿」之後。[125]而高麗國承襲隋代儀制,每年年初,高麗國王出行乘坐腰輿,陳列函簿儀仗,觀看高麗人聚集在涓水邊演奏樂器和玩樂。[126]由於「輿」車型較「輦」小,官員私底下會面多乘輿較不受人矚目,如唐德宗剛即位,黎幹乘輿秘密到劉志翼家中,暗中陰謀叛變。[127]

3.1.2 「輦」和「輿」使用場合不同

「輦」為皇帝的車駕之一,逐漸成為國家或首都的代名詞。如王雄誕曾說當今方太平,吳王在「京輦」,國家聲威,無遠不被,可知「京輦」代稱國都。[128]武德四年(621)6月,高祖為褒獎李世民(後來唐太宗)平竇建德與王世充之亂功績,凱旋後高祖在宗廟舉行飲至禮,太宗親披黃金甲,陳列鐵馬騎兵一萬人,披甲戰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將俘虜二位偽主,和隋朝器物、「輦輅」獻於太廟, [129]此舉象徵唐朝征服前朝的政權,標誌新政權的建立。

唐代皇帝在宮廷禁苑內行走或私宴場合使用「輦」,而自宮殿閣內升正殿時使用「輿」。「輦」由人抬行,較「輅」安穩舒適,皇帝生病多乘坐「輦」,如唐太宗罹患癰瘡症,皇太子李治親吮膿瘡,扶輦步行跟隨好幾日,可知太宗生病出行應乘坐「輦」。[130]

「輿」亦由人抬行,軟輿形制較小,多使用於宮城正殿內,穿梭在大明宮各殿門中行走較為快速安全。如太和八年(834)11月21日,唐文宗御紫宸殿為內朝,公卿大臣排列入閣上奏後依次退下,文宗乘軟輿出紫宸門,進入外朝含元殿東階升殿,宰相及侍臣分立於副階,文武兩班列於殿前。此時,李訓計畫誅殺宦官,左右軍中尉、樞密內臣到左仗院,聽聞幕下有兵器碰撞聲,驚恐走出,隨即抬軟輿迎接文宗,繞進宣政門,進入東上閣門,門關上後,宦官呼喊萬歲,可見唐朝皇帝在大明

宮內遇到緊急情況時乘軟輿由宦官抬行以利躲避避難。

[131]

學者推測墓主出行時乘輿,也可能是統軍戰鬥的乘輿。[132]步輿,又稱平肩輿,三國東晉南朝名士多乘輿。三國征戰時,司馬懿人稱武侯,乘輿、持白羽扇指揮作戰,為名士的象徵。[133]唐代軍事作戰時,將領也乘輿。天寶十四載(755)11月甲子,安祿山以討楊國忠為名,乘坐鐵轡閱兵,走出薊城南門檢校軍容,步兵與騎兵顯得相當精銳,訓練有素。[134]安史之亂時,張弘靖過慣富貴生活,又不熟悉風土民情,在三軍之中乘坐肩輿進入燕地。[135]可知「輿」為唐代統軍將領的出行工具。

此外,隋唐皇帝行幸時多乘輿,裝載行幸途中物資,輿車形制較小,巡幸時輕便行走抬行,但也因輿車形制小,每車裝載量不多,隨行輿車數量繁多。隋煬帝大業元年(605)8月壬寅遊幸江都,所經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 [136]可知隋煬帝巡幸時乘輿,裝載百姓獻食。大業十二年(616),隋煬帝巡幸甘泉宮徵求螢火蟲,所司命數千人採拾,夜間以五百輦釋放螢火蟲,螢光遍佈山谷。[137]此外,唐朝皇帝巡幸時需攜帶「天子八寶」由五輿車隨駕。符寶郎掌管天子八寶璽,即「神寶、受命寶、皇帝行寶、皇帝之寶、皇帝信寶、天子行寶、天子之寶、天子信寶」,以函盒封裝,放置五輿車中,隨皇帝出行。[138]

從上述可知,「輦」和「輿」雖相似,但從形制和使用場合看來,「輦」的等級應高於「輿」。

4. 結論

圖像猶如一把刀的兩面刃,一方面,圖像可以栩栩如生地呈現文字無法表達的清楚樣貌;另一方面,圖像的真實性是否如實呈現出實際形制,也值得深思與探討。在沒有照相存真的年代,寫實性的繪卷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歷史紀實的意義,主要在內容上具有示意性質,無法詳細地呈現整個歷史事件發生的過程。記事性的圖畫,有時會基於藝術表現效果方面的考慮,強調或簡化某些現象的描寫。[139]因此,《大輦輿簿圖畫》只能作為表現宋仁宗最後一次前往城南青城祭祀天地的場面,在視覺上的參考數據,其詳盡程度與真實性無法與文獻相比。

首先,從現存的圖像可知,在形制上,唐代皇帝行幸時乘坐的「輅」、「輦」和「輿」,具有三種不同形制的等級。第一等為「輅」,帝王車駕中最高級別的有輪車,唐朝與北宋「輅」均由六匹馬駕車,南宋以後改由人力牽引挽拉。第二等為「輦」,帶有車屋的無輪車,一般由人扛抬至肩,形制較「輿」大,可以承載較多重

量，唐代以「輦」搬運屍體或財物。唐代皇帝在宮廷禁苑內行走或私宴場合使用「輦」。第三等為「輿」，不帶車屋的無輪車，「輿」的形制較「輦」小，車體為方形，有「板輿」、「腰輿」、「平肩輿」等多種形制，唐代皇帝自宮殿閣內升正殿時使用「輿」，皇帝行幸和統軍戰鬥也多乘輿。

其次，在禮制上，唐代皇帝在宮廷、宮殿和巡幸等不同場合，「輅」、「輦」和「輿」三種車駕，具有不同的作用。最高級別的「輅」是皇帝出行專屬最高級別車駕，唐代對於「輅」、「輦」和「輿」三種級別的車駕有嚴謹的禮制規範。

最後，在身分上，唐代皇帝巡幸的大駕鹵簿中，「輅」、「輦」和「輿」三種車駕，除外觀形制不同，並非僅是彰顯皇權尊貴的儀仗排場，也不僅是陳列觀賞的車駕器物；而是在禮制的身分秩序之中具有辨貴賤、序尊卑的意義，和實際的交通運作之中具有實用性的規範與功能。

文 獻

- [1]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收錄於于安瀾編，《畫史叢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第一冊，頁1。
- [2] 孫正軍利用《歷代帝王圖》為線索，提出圖像證史的研究取徑與反思，見孫正軍〈重視圖像自身的脈絡——以《歷代帝王圖》皇帝異服為線索〉，《唐研究》第二十四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頁301-302。
- [3] (英) 貢布里希 (E. H. Gombrich) 著，范景中等譯，〈視覺圖像在信息交流中的地位〉，《圖像與眼睛——圖畫再現心理學的再研究》（南京：廣西美術出版社，2016-6），頁137-155。
- [4] 渡辺浩，〈「御威光」と象徴——徳川政治體制の一側面〉，《東アジアの王權と思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頁16-60。中譯本見渡邊浩，〈「御威光」與象徴——徳川政治體制的一側面〉，《東亞的王權與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13-45。
- [5] 劉增貴，〈漢隋之間的车駕制度（附勞餘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分，1993-5，頁371-395。
- [6] 有關唐代鹵簿制度緣起，參見古怡青，〈試論唐代皇帝巡幸的乘輿制度〉，《法制史研究》第36期，2019-12，頁6-9。
- [7] 練春海，《漢代車馬形像研究——以御禮為中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7。
- [8] 前引劉增貴，〈漢隋之間的车駕制度（附勞餘跋）〉，頁371-453。
- [9]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附檢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卷14，「車部」，頁301。
- [10] 三國吳·韋昭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13，〈晉語〉「悼公賜魏絳女樂歌鍾」條，頁443。
- [11] 清·王先謙，《釋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7，〈釋車〉，頁1090。
- [12] 本表整理自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1），卷27，〈春官·巾車〉，頁40。
- [13]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宋刻遞修本）（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10，〈禮儀志〉，頁191。
- [14] 練春海認為孫機主張東漢尚玉輅，但形制可能和金根車相仿，考古也沒有證據說明漢代有「玉輅」出現，參見前引練春海，〈第三章 車容〉，《漢代車馬形像研究——以御禮為中心》，頁82-87。
- [15] 唐·杜佑著，王文錦等點校，《通典》（萬有文庫十通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64，〈嘉禮〉「天子車輅·輅」，頁1789。
- [16] 有關鹵簿制度源起，參見前引古怡青，〈試論唐代皇帝巡幸的乘輿制度〉，頁6-8。
- [17] 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17），卷17，〈輿服志〉，頁333。
- [18] 孫機，《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82）認為「輅」在箱後插「旂旗」有二特徵，一是旗上畫蛟龍，二是竿首有鈴，此特點從西晉開始明確，但這兩項特徵在《晉顧愷之洛神圖》看不清楚。愚意以為「旂旗」竿首有鈴的特徵，至遲應自東漢開始，據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後漢書·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87），「車馬飾·諸車之文」，頁3652：「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橫文畫輶，龍首鸞衡，重牙班輪，升龍飛輅。」「飛輅」即指「旂旗」竿首有鈴的特徵。
- [19] 《通典》，卷65，〈嘉禮〉「公 侯 大夫等車輅·後漢」，頁1824。
- [20] 《通典》，卷64，〈嘉禮〉「天子車輅·輅·後漢」，頁1789。
- [21] 後晉·劉昫撰，《舊唐書》（清懼盈齋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45，〈輿服志〉「天子車輿」，頁1932。
- [22]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5，〈輿服志〉，頁753。
- [23] 《隋書》，卷10，〈禮儀志〉「輿輦·陳」，頁195：「以綠畫赤油，長三尺，廣八寸，繫兩軸頭，古曰飛輅，改以綠畫蛙螭幡，綴兩軸頭，即古飛輅遺象也。」
- [24] 「晉顧愷之洛神圖」，作品號「故-畫-001289-00001」，引自故宮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14621（2020.8.28上網檢索）。
- [25] 學者比對《晉書·輿服志》、《唐六典》及《通典》等文獻，認為五輅在晉武帝時期被創造出來的錯誤訊息，參見黃楨，〈中古天子五輅的想像與真實——兼論《晉書·輿服志》車制部分的史料構成〉，《文史》第4輯，2014，頁55-73。
- [26] 蕭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8，〈禮志〉，頁525。
- [27] 《南齊書》，卷17，〈輿服志〉，頁340。
- [28] (日) 戶川貴行，〈劉宋孝武帝的禮制改革について——建康中心の天下觀との關連からみた——〉，《東洋史論集》（九州大學），36期，2008-3，頁68-87。
- [29] 天興二年（399），制定「三駕鹵簿」，依國事大小不同分為三等，一是「大駕」軍戎、大祠時使用。二是「法駕」，巡狩、小祠時使用。三是「小駕」，遊宴離宮時使用。參見《通典》，卷66，〈嘉禮〉「鹵簿 屬車附·後魏」，頁1848。
- [30] 敦煌296窟「一三五 東王公」，段文傑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第三集 北周卷）（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1），頁126。
- [31] 《晉書》，卷25，〈輿服志〉，頁753。

- [32] 《隋書》，卷 10，〈禮儀志〉「輿輦·陳」，頁 195。
- [33] 《隋書》，卷 10，〈禮儀志〉「輿輦·後魏」（頁 195）誤載為「熙平九年」，然「熙平」僅三年，疑誤。據《通典》，卷 64，〈嘉禮〉「天子車輅·五輅·後魏」，頁 1793：「明帝熙平中，侍中崔光等議，大造車服，五輅並駕五馬，亦無經據。」
- [34] 楊伯峻撰，《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3，〈周穆王〉注載《史記》，頁 95。
- [35] 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5，〈秦本紀〉郭璞【集解】，頁 174。
- [36] 《隋書》，卷 10，〈禮儀志〉「輿輦·周」，頁 195。
- [37] 《通典》，卷 64，〈嘉禮〉「天子車輅·五輅·後周」，頁 1793：「馬皆疏面，旂就以方色，俱十有二。」《隋書》，卷 10，〈禮儀志〉「輿輦·周」，頁 196：「皆疏面，旂就以方色，俱十有二。」「旂」指旗子下垂下來的綵帶，應指「旂」。
- [38] 前引孫機，《中國古輿服論叢》（頁 84）認為車輅有蓋應自晉代開始。據《通典》，卷 64，〈嘉禮〉「天子車輅·輅·後漢」（頁 1789），愚意以為東漢應已有此制。
- [39] 《南齊書》，卷 17，〈輿服志〉，頁 334。
- [40] 《通典》，卷 64，〈嘉禮〉「天子車輅·天子車輅·齊」，頁 1792。
- [41] 敦煌研究院、賀世哲主編，《敦煌石窟全集 7：法華經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頁 24。
- [42] 《隋書》，卷 12，〈禮儀志〉，頁 253-254。
- [43] 元·脫脫等撰，《宋史》（元至正本配補明成化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49，〈輿服志〉「五輅」，頁 3479-3480。
- [44] 本圖說明參見陝西歷史博物館編，《中國古代壁畫 唐代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第一冊（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7-8），頁 247。
- [45] 本圖源自前引陝西歷史博物館編，《中國古代壁畫 唐代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第一冊，頁 134。
- [46] 王仁波，〈唐懿德太子墓壁畫題材的分析〉，《考古》第 6 期，1973，頁 391。
- [47] 有關唐代皇太子車輅形制，見《舊唐書》，卷 45，〈輿服志〉「皇太子車輅」，頁 1934。
- [48] 本圖源自前引陝西歷史博物館編《中國古代壁畫 唐代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第一冊，頁 132。
- [49] 本圖源自前引陝西歷史博物館編《中國古代壁畫 唐代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第一冊，頁 152。
- [50] 《舊唐書》，卷 86，〈懿德太子重潤傳〉，頁 2834-2835。
- [51]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廣池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17，〈太僕寺〉「乘黃令」條，頁 481。
- [52] 宋·王溥撰《唐會要》（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北京：中華書局，1955），卷 32，〈輿服〉「輅車」條，頁 583。（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11）〈鹵簿令〉「天子鑾輅及駕行導駕」，頁 477。
- [53] 宋·沈括，《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9，〈器用〉，頁 642。
- [54]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 10，〈駕宿太廟奉神主入室〉注引蔡條《鐵圍山叢談》，頁 248。
- [55] 《宋史》，卷 145，〈儀衛志〉「國初鹵簿」，頁 3406。
- [56] 本圖引自呂章申主編，《中華文明》（「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藏品研究系列叢書」之一）（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頁 636-637。
- [57] 宋·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28，〈本朝〉「法制」，頁 3066。
- [58] 孫機，〈輅〉，《駢馳駢驅：中國古代車馬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8），頁 112-115。
- [59] 《宋史》，卷 149，〈輿服志〉「五輅」，頁 3484。
- [6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頁 274-276。
- [61] 參見馮鳴陽，〈「帝國映射」與「崇儒教化」：南宋畫院人物畫政治功能的兩種類型〉，《民族藝術》第 4 期，2015，頁 150。
- [62] 本圖引自故宮書畫典藏資料索引系統，作品號「故-畫-001224-00006」，品名「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 冊 諸侯章(畫)」，http://painting.npm.gov.tw/Painting_Page.aspx?dep=P&PaintingId=253（2020.8.28 上網檢索）。
- [63]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一三三」鹵簿玉輅圖 卷 無款，《中國美術全集 繪畫編 4 兩宋繪畫 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177。
- [64] 周成編著，《中國古代交通圖典》（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頁 98。
- [65] 《後漢書》，卷 7，〈祭祀志〉「封禪」條引干寶《周禮》注云，頁 3169。
- [66] 楊泓，〈步輿·平肩輿·步輦〉，《逝去的風韻：楊泓談文物》（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5-19。
- [67] 黃正建，〈腰輿〉，收入氏著《走進日常：唐代社會生活考論》（上海：中西書局，2016-6），頁 201-203。
- [68] 許慎，《說文解字（附檢字）》，卷 14，「車部」，頁 303。
- [69] 《唐六典》，卷 11，〈殿中省〉「尚輦局」條注云，頁 331。
- [70] 《後漢書》，卷 16，〈寇恂傳〉前書音義注曰，頁 622：「驪駕，併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 [71]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44，〈淮南厲王長傳〉，頁 2140。
- [72] 《通典》，卷 66，〈禮典〉「嘉禮·輦輿·後魏」條，頁 1839。
- [73]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第 3 期，1972，頁 20-33、64。
- [74] 本圖擷取自韋正，〈尋顧愷之畫作與畫跡：傳顧愷之《洛神賦圖》和司馬金龍墓屏風漆畫發微〉，《將毋同：魏晉南北朝圖像與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9），頁 312。
- [75] 陳葆真，〈第一章 對大英本《女史箴圖》的圖文關係、繪畫風格和斷代問題的新見〉，《圖畫如歷史：中國古代宮廷繪畫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6），頁 11、45。
- [76] 韋正認為顧愷之繪製《女史箴圖》的時代指向南朝，而非東晉。而司馬金龍墓漆畫表現中國北方風格。參見前引韋正〈尋顧愷之畫作與畫跡：傳顧愷之《洛神賦圖》和司馬金龍墓屏風漆畫發微〉，《將毋同：魏晉南北朝圖像與歷史》，頁 296-299。
- [77] 陳葆真不同意韋正看法，認為漆畫屏風可能作於北方，但畫風受到南方影響，推斷漆畫可能受到顧愷之繪製《女史箴圖》影響。參見前引陳葆真，〈第一章 對大英本《女史箴圖》的圖文關係、繪畫風格和斷代問題的新見〉，《圖畫如歷史：中國古代宮廷繪畫研究》，頁 38-39、41。
- [78] 漢·衛宏撰、清·紀昀等輯，《漢官舊儀》（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下〈中宮及號位〉，頁 41。2019 年 7 月 28-29 日，「第七屆中國中古史前沿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評論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後王彬先生提供本條史料，特此致謝！
- [79] 《漢書》，卷 97，〈外戚傳〉「孝成班婕妤」，頁 3983-3984。

- [80] 《隋書》，卷 10，《禮儀志》「輿輦·隋」條，頁 210。
- [81] 前引韋正〈尋顧愷之畫作與畫跡：傳顧愷之《洛神賦圖》和司馬金龍墓屏風漆畫發微〉，《將毋同：魏晉南北朝圖像與歷史》，頁 310。
- [82] 前引陳葆真，〈第一章 對大英本《女史箴圖》的圖文關係、繪畫風格和斷代問題的新見〉，《圖畫如歷史：中國古代宮廷繪畫研究》，頁 23-24。
- [83] 考古報告稱「瓷步輦俑」，見黃啟善，〈廣西永福縣壽城南朝墓〉，《考古》第 7 期，1983，頁 612、624。
- [84]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鄧縣彩色畫像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頁 27。
- [85] 前引楊泓，〈步輦·平肩輿·步輦〉，《逝去的風韻：楊泓談文物》，頁 16。
- [86] 古怡青〈試論唐代皇帝巡幸的乘輿制度〉，《法制史研究》第 36 期，2019，頁 42-48。
- [87] 唐·張鷟，《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一，頁 6：「更有挽郎、輦腳、營田、當屯，無尺寸工夫，并優於處分。」
- [88] 《舊唐書》，卷 87，《魏玄同傳》，頁 2851。同條見《新唐書》，卷 117，《魏玄同傳》，頁 4253。
- [89] 本圖修改自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華文明：古代中國陳列文物精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637。
- [90] 《宋史》，卷 149，《輿服志》「大輦」，頁 3486-3487。
- [91] 參見（日）麻生磯次編，《古典圖鑑》（東京：明治書院，1979），頁 81。
- [92] 米德昉，〈敦煌莫高窟第 100 窟窟主及年代問題再議〉，《敦煌研究》第 4 期，2012，頁 61-66。
- [93] 本圖引自段文傑著，《中國敦煌壁畫全集》（第九集 敦煌五代·宋卷）（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1），頁 48。
- [94] 《唐六典》，卷 11，《殿中省》「尚輦局」條，頁 331-332。《通典》，卷 66，《禮典》「嘉禮·輦輿」，頁 1840。
- [95] 前引黃正建，〈腰輿〉，收入氏著《走進日常：唐代社會生活考論》，頁 201-203。
- [96] 胡晶，〈《步輦圖》概念的歷史生成〉，《首都博物館論叢》，2018，頁 175-183。
- [97] 本圖引自 Chen, B. Figure 3.18. Empire of Style: Silk and Fashion in Tang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9, P.100. 亦可參見北京故宮博物院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34620.html>。（2019.7.2 上網檢索）
- [98] 前引楊泓，〈步輦·平肩輿·步輦〉，《逝去的風韻：楊泓談文物》，頁 19。
- [99] 參見前引（日）麻生磯次編《古典圖鑑》，頁 81。
- [100] 前引古怡青，〈試論唐代皇帝巡幸的乘輿制度〉，頁 42-48。
- [101] 本圖引自前引 Yu Weichao, D. Y. "Exhibition of Chinese history /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 pp.134-135.
- [102] 《隋書》，卷 10，《禮儀志》「輿輦·梁」條，頁 194
- [103] 本圖修改自前引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華文明：古代中國陳列文物精華》，頁 637。本圖亦可參見前引 Yu Weichao, D. Y. "Exhibition of Chinese history /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 pp.134.
- [104] 《東京夢華錄注》，卷 4，〈公主出降〉「檐子」條注引俞正燮，《癸巳類稿》，卷 14，《輜釋名》，頁 127。
- [105] 《宋史》，卷 149，《輿服志》「腰輿」，頁 3490：「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銅螭頭，緋繡風裙襪，上施錦褥，別設小牀，緋繡花龍衣。奉輿十六人。中輿制，亦質，方形，四面曲圍，下結繡裙網。制如小輿，惟無翟尾、玉照子、三級床、曲柄蓋，而上設方御床、曲几，昇竿無螭首，用亦同小輿。」
- [106] 前引楊泓，〈步輦·平肩輿·步輦〉，《逝去的風韻：楊泓談文物》，頁 19。
- [107] 《唐六典》，卷 17，《太僕寺》「乘黃令」條，頁 481。
- [108] 唐·蕭嵩著，（日）池田溫解題，《大唐開元禮》（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光緒 12 年洪氏公善堂刊本）（東京：古典研究會，1972），卷 2，《序例》：「駕士三十二人」。《新唐書》，卷 23，《儀衛志》：「駕士三十二人」。
- [109] 《舊唐書》，卷 2，《太宗本紀》，頁 28。《舊唐書》卷 67〈李勣傳〉，頁 2484-2485。
- [110] 《舊唐書》，卷 45，《輿服志》「皇太子車輅」條，頁 1934。
- [111] 朱筱新認為「隋代「步輦」，又稱「腰輿」正式成為皇帝專用車駕之一，大禮皆乘坐。」參見朱筱新〈六、鹵簿車仗〉，《中國古代禮儀制度》（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5），頁 188-189。
- [112] 《通典》，卷 66，《禮典》「嘉禮·輦輿·隋」，頁 1840。
- [113] 《隋書》，卷 10，《禮儀志》「輿輦·梁」條，頁 192。
- [114] 《通典》，卷 66，《禮典》「嘉禮·輦輿·齊」條，頁 1839。
- [115] 《通典》，卷 66，《禮典》「嘉禮·輦輿·梁」，頁 1839。
- [116] 《隋書》，卷 10，《禮儀志》「輿輦·隋」條，頁 210。
- [117] 《舊唐書》，卷 183，《薛懷義傳》，頁 4743。
- [118] 《舊唐書》，卷 49，《食貨志》「漕運」條，頁 2116。
- [119] 《舊唐書》，卷 127，《姚合言傳》，頁 3571-3572。
- [120] 《舊唐書》，卷 181，《樂從訓傳》，頁 4690。
- [121] 《舊唐書》，卷 164，《李絳傳》，頁 4285-4286。
- [122] 《舊唐書》，卷 142，《王廷湊傳》，頁 3885。
- [123] 《舊唐書》，卷 141，《田弘正傳》，頁 3851-3852。
- [124] 《舊唐書》，卷 142，《王廷湊傳》，頁 3886。
- [125] 《隋書》，卷 10，《禮儀志》「輿輦·梁」條，頁 192。
- [126] 《隋書》，卷 81，《東夷傳》「高麗」，頁 1814。
- [127] 《舊唐書》，卷 118，《黎幹傳》，頁 3426。同條見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225，《唐代宗紀》「大曆十四年」條，頁 7260。
- [128] 《舊唐書》，卷 56，《王雄誕傳》，頁 2272。
- [129] 《舊唐書》，卷 2，《太宗本紀》，頁 28。
- [130] 《舊唐書》，卷 4，《高宗本紀》，頁 66。
- [131] 《舊唐書》，卷 169，《李訓傳》，頁 4397-4398。
- [132] 前引楊泓，〈步輦·平肩輿·步輦〉，《逝去的風韻：楊泓談文物》，頁 16-17。
- [133]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 774，《車部》「輿」（頁 3563-2）載《語林》曰：「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乘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皇聞而嘆曰：可謂名士。」
- [134] 《資治通鑑》，卷 217，《唐玄宗紀》「天寶十四載」（755），頁 6935。
- [135] 《舊唐書》，卷 129，《張弘靖傳》，頁 3611。
- [136] 《資治通鑑》，卷 180，《隋煬帝紀》「大業元年」條，頁 5620-5621。
- [137] 唐·吳兢，《貞觀政要》（臺北：宏業書局，1988），卷六，

〈慎言語〉，頁 171。同條見《資治通鑑》，卷 183，〈隋煬帝紀〉「大業十二年」條，頁 5703。

- [138] 《通典》，卷 63，〈禮典〉「嘉禮·天子諸侯玉佩劍綬璽印」，頁 1770。《唐六典》，卷 8，〈符寶郎〉，頁 252。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149，〈褚遂良〉「玉璽記」，頁 1514-1。
- [139] 陳葆真，〈第五章 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對江南名勝和園林的繪製與仿建〉，《圖畫如歷史：中國古代宮廷繪畫研究》，頁 201。

參考書目

1. 傳統文獻

- 三國吳·韋昭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
- 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漢·衛宏撰、清·紀昀等輯，《漢官舊儀》，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附檢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
-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後漢書》（宋紹興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17。
- 蕭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廣池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唐·杜佑著，王文錦等點校，《通典》（萬有文庫十通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宋刻遞修本），北京：中華書局，1973。
- 唐·蕭嵩著，（日）池田溫解題，《大唐開元禮》（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光緒 12 年洪氏公善堂刊本），東京：古典研究會，1972-11。
- 唐·張鷟，《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後晉·劉昫撰，《舊唐書》（清懼盈齋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宋·王溥撰，《唐會要》（清乾隆欽刻武英殿聚珍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宋·沈括，《夢溪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
- 宋·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4。
- 元·脫脫等撰，《宋史》（元至正本配補明成化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王先謙，《釋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日）仁井田陞撰，《唐令拾遺》，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4。

2. 近人著作（依作者姓名筆劃，同作者依出版先後排列）

2.1 專書

- （英）貢布里希（E. H. Gombrigg）著，范景中等譯 2016 《圖像與眼睛——圖畫再視心理學的再研究》，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
-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1988 《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 4 兩

- 宋繪畫 下》，北京：文物出版社。
-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 2010 《中華文明：古代中國陳列文物精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朱筱新 1995 《中國古代禮儀制度》，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呂章申主編 2017 《中華文明》（「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藏品研究系列叢書」之一），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 周成編著 1995 《中國古代交通圖典》，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
-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 1958 《鄧縣彩色畫像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 段文傑主編 2006 《中國敦煌壁畫全集》（第三集 北周卷），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 段文傑著 2006 《中國敦煌壁畫全集》（第九集 敦煌五代·宋卷）（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 韋正 2019 《將母同：魏晉南北朝圖像與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孫機 2016 《載馳載驅：中國古代車馬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孫機，《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陝西歷史博物館編 2017 《中國古代壁畫 唐代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第一冊，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 1995 《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 張彥遠 1982 《歷代名畫記》，收錄於于安瀾編，《畫史叢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陳葆真 2019 《圖畫如歷史：中國古代宮廷繪畫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敦煌研究院、賀世哲主編，《敦煌石窟全集 7：法華經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
- 黃正建 2016 《走進日常：唐代社會生活考論》，上海：中西書局。
- 楊泓 2007 《逝去的風韻：楊泓談文物》，北京：中華書局。
- 練春海 2017 《漢代車馬形像研究——以禦禮為中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2 論文

-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 1972 〈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第 3 期，頁 20-33、64。
- 王仁波 1973 〈唐懿德太子墓壁畫題材的分析〉，《考古》第 6 期，頁 381-393+371+402-405。
- 古怡青 2019 〈試論唐代皇帝巡幸的乘輿制度〉，《法制史研究》第 36 期，頁 1-56。
- 朱溢 2018 〈南宋大禮制制度及其實踐〉，《2018 年杭州文史論壇暨中國南宋史及南宋都城臨安國際學術研討會》，頁 109-122。
- 米德昉 2012 〈敦煌莫高窟第 100 窟窟主及年代問題再議〉，《敦煌研究》第 4 期，頁 61-66。
- 胡晶 2018 〈《步輦圖》概念的歷史生成〉，《首都博物館論叢》，頁 175-183。
- 孫正軍 2019 〈重視圖像自身的脈絡——以《歷代帝王圖》皇帝異服為線索〉，《唐研究》第二十四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301-340。
- 馮鳴陽 2015 〈「帝國映射」與「崇儒教化」：南宋畫院人物畫政治功能的兩種類型〉，《民族藝術》第 4 期，頁 150-158。
- 黃啟善 1983 〈廣西永福縣壽城南朝墓〉，《考古》第 7 期，頁 612-613、623-624。
- 黃楨 2014 〈中古天子五輅的想像與真實——兼論《晉書·輿服志》

車制部分的史料構成)，《文史》第4輯，頁55-73。

劉增貴 1993 〈漢隋之間的车駕制度（附勞鞞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分，頁371-453。

3. 日本文獻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

麻生磯次編，《古典圖鑑》，東京：明治書院，1979。

戶川貴行 2008 〈劉宋孝武帝の禮制改革について—建康中心の天下觀との關連からみた—〉，《東洋史論集》（九州大學），36期，頁68-87。

渡辺浩 1997 〈「御威光」と象徵—德川政治體制の一側面〉，《東アジアの王權と思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頁16-60。中

譯本見渡邊浩，〈「御威光」與象徵—德川政治體制的一個側面〉，《東亞的王權與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13-45。

4. 英文文獻

Chen, B. *Empire of Style: Silk and Fashion in Tang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9.

Yu Weichao, D. Y. “Exhibition of Chinese history /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Beijing :Morning Glory Publishers, 1998.

〈作者略歷〉

古怡青

1996年輔仁大學歷史系與國際貿易學系（雙學位）畢業，2001年台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畢業。2012年台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畢業。現任淡江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副教授。